



西风残照 中的雁阵

徐志摩 / 谈 / 文学创作

中国人说小说是娱乐的 这是根本错误
我们即使不以文学为职业 也应该养成文学的兴味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



西风残照中的雁阵

徐志摩／谈／文学创作

徐志摩／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风残照中的雁阵：徐志摩谈文学创作 / 徐志摩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4
(再读徐志摩)
ISBN 978-7-201-08031-4

I. ①西… II. ①徐… III. ①文学创作-创作理论
IV. ①I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0823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

字数：200 千字

定 价：28.00 元

满目纷繁说文学

(代序)

徐志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化界非常活跃的人物。他不仅有大量的诗文面世,而且对于当时文坛的发展走向,也发挥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他的文学评论,便是这方面的显著例子。

当然,文学评论,也往往不免于人事纠纷、意气纷争。徐志摩是个生性单纯的人,不太懂人情世故,还以为做一个批评朋友缺点的诤友是理所应当的呢,结果却不免碰壁。1923年5月,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新诗的文章,其中不指名地引用了郭沫若一首诗的句子,说:“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看看窗外的云光水色,不觉大大的动了伤感,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他就使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

这一评可捅了马蜂窝,引起创造社诸君的愤怒。成仿吾愤而写了绝交信,称:“你一方面虚与我们周旋,暗暗里却向我们射冷箭,志摩兄!我不想人之虚伪,一至于此!”

而且,以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为中坚的创造社,与以胡适为首的文学研究会之间是有矛盾的,徐志摩又与胡适过从甚密,也引起创造社诸位的愤恨,直呼徐志摩为“Fake man”(虚伪的人)。而徐志摩又

徐志摩谈文学创作

曾私下笑谈过茅盾有关“雅典主义”的翻译错误,由此也得罪了文学研究会。因此,徐志摩急急写了一篇公开信《天下本无事》,力图澄清事实,称自己只想到评论作品本身,而没想到要与人“抬杠”。他希望彼此“消除成见的暴戾与专愎,在真文艺精神的温热里互感彼此心灵之密切”。

尽管如此,他没有停止自己对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主张。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出他的努力。

一、对文艺理论的看法

关于小说的功能的认识,徐志摩说,“中国人说小说是娱乐的,这是根本错误”。他认为,文学要反映社会现实问题。

围绕徐志摩的小说《春痕》,曾有过争论。一位女士读了小说后认为,故事反映了一般男子的本性:只看重女人的年轻与美貌,一旦色衰,则男人心中的爱恋也变作了厌恶。徐志摩强调对方没看明白自己的用意,指出不要把那段故事看作厌世观的宣泄,不要把重色视作男人的通性,不要把世间男人都看得太粗俗,不要认为恋情的有无全凭色相的幻象。作者不是要表达对失去美色后的女人的嘲讽,相反,而是要对“世俗的做妻做母负担之惨酷”的现状作“人道的抗议”!在“个性湮灭的社会里”,春痕即使在性灵上再纯真、智力上再自觉,也难免在社会公认的女子理想标准中变得平庸,以至于粗俗。

徐志摩还从英国的一份杂志上翻译了一篇小说《生命的报酬》,他对于小说中所展现的“人的意志的贞,品格的洁,与灵魂的勇敢”,尤其是小说主人公代表了“意大利或是任何大民族不死的国魂”。徐志摩正是希望这样的小说,能唤起中国民众的觉醒,“我们应当在这里面发现我们自己应有的声音”,即使我们的身影寒伧卑微,而我们传统的“知

耻”与“有节”的观念的承传,已成为一种民族的人格。我们应当看分明“破坏性的事实里,往往涵有真建设的意义”,“造成国民性或国魂的是革命”。虽然徐志摩对于共产党并不理解,而他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评价已上升到是铸造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的高度,则文学的意义,就不只是闲情逸致的抒发了。关于这一点,可以读读他的《从小说讲到大事》一文。

徐志摩从西方文学角度看文学的特征,还提出了读西洋文学作品,须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一、女子的地位和恋爱的观念;二、社会上的道德观念和标准;三、中古时代的制度以及因此发生的风俗和习惯;四、希腊和拉丁神话中的故实;五、宗教;六、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可见文学是与社会文化紧密相关联的,不能就文学谈文学,为文学而文学。

二、办文学报刊的理念

徐志摩一主持《晨报副刊》,就写了一篇《迎上前去》,说“在这灰这断片这泥的底里他再来发现他更伟大更光明的理想”,也就是他是充满着理想去作出自己的努力。后来,他又与同人合办《新月》杂志,也是认定“我们想像中曙光似的闪动,还不是生命的又一个阳光充满的清朝的预告”。他是有理想的,希望给思想文化界带来一股清风。

首先,他努力组织一支得力的作者队伍。接手《晨报副刊》,徐志摩宣称可以邀约强有力的作者来协办,其中包括梁启超、赵元任、张奚若、胡适、江绍原……几十位大家,都是当时学界响当当的角色。“请姚茫父、余越园先生谈中国美术;请刘海粟、钱稻孙、邓以蛰诸先生谈西洋艺术;余上沅、赵太侔谈戏剧;闻一多先生谈文学;翁文灏、任叔永诸

先生专撰科学的论文；萧友梅、赵元任先生谈西洋音乐；李济之先生谈中国音乐。”他更写信到上海，向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约稿；写信到武昌，向他的老朋友郁达夫约稿。他办《剧刊》《诗刊》《新月》，都是尽力罗致最有水准的作者，让所办刊有了一种无形的影响力。

其次，他办刊，要求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人格。“我办就办，办法可得完全由我，我爱登什么就登什么”。并且，“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与褊浅我是不来的。我来只认识我自己，只知对我自己负责任。我不愿意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说的；我要说的话你逼我求我我都不能不说的”。

也就是说，他办刊，须有他所主张的思想。在《新月的态度》一文中，他提出了一个“纯正的思想”的概念，希望由此达到人生改造的目的，实现我们自身活力的解放。“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他要警醒自身，唤醒世人，以实现“这时代的‘创造的理想主义’的高潮”的到来。

为此，他“有一个愿心”，就是“我想把我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我的读者们，我心目中的读者们，说实话，就只这时代的青年。我觉着只有青年们的心窝里有容我的空隙，我要偎着他们的热血，听他们的脉搏。我要在我自己的情感里发见他们的情感，在我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他要表达的是要与青年人的情感和追求保持一致，成为他们的人生体验的一部分。

再次，他追求真正的艺术园地的形成。《晨报副刊·剧刊》的创刊，便是他的艺术追求的尝试。“戏剧是艺术的艺术。因为它不仅包含诗、文学、画、雕刻、建筑、音乐、舞蹈各类的艺术，它最主要的成分尤其是

人生的艺术”。而他正是要借这艺术的艺术，“小之震荡个人的灵性，大之摇撼一民族的神魂”。因此，他主张在《剧刊》上宣传戏剧观念，讨论戏剧派别及其价值，介绍中外名剧，研究剧艺各种门道。这在中国现代戏剧发展史上，是值得好好书写一笔的。只可惜《剧刊》只出了十五期，便终结了。

他还与邵洵美等创办了《诗刊》。在《〈诗刊〉序语》中，他说：“我们共信诗是一种艺术”，想与对诗有兴趣的朋友一起，“斗胆在功利气息最浓重的地处与时日，结起一个小小的诗坛”，“希冀早晚可以放露一点小小的光”。他相信诗歌是有前途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不可缺少的声音。从中可以听出民族精神的“旺盛抑销沉”。现在需要的是，不经意间的抒情的诗意，“竟许可以开成千百万人热情的鲜花，绽出瑰丽的英雄的果实”。

最后，他一直致力于现代文学艺术道路的探索。当中国新诗在一大批新诗人的探索下百花竞放时，也有人担忧这种与西方文学日益接近的文学道路，是否将导致中国固有文学特性的消失：“与你们自己这份家产的一点精神不是相离日远了吗？”“你们怎样对得住你们的屈原陶潜李白？”历史证明这样的担忧纯属多余，而在当年，却是要有勇气去面对的。徐志摩说，文学上的革命正如政治上的透明是一样的，正经历着时代的震荡。此时正是走到了半路，绝不能因顾忌这顾忌那就半途而废。求索之路正如卷进潮流的人一般，“在水雾昏花里勉强辨认周围的光景”，虽然“离‘静观自得’的境界还差得远”，但拥有这个时代本身，已远比那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那些站在岸边的看客更有意义。

三、对名家名作的探讨

徐志摩极看重人文精神的探求。从他所关注的丹农雪乌(邓南遮)、托尔斯泰、太戈尔(泰戈尔)等著名作家来说,他一直在努力从他们的作品中,触及他们的思想和灵魂,了解其艺术与社会、与人生的关联。

徐志摩对丹农雪乌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与品读。丹农雪乌是意大利著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民族主义者。文学创作甚丰,早年的创作具有现实主义倾向,后来倾向于唯美主义写作,影响很大。

徐志摩看出了其作品中折射的作者自身的影子,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变相的自传”。因他本身带着与众不同的怪异特征,使得他的作品也充满着奇异与疯狂:“爱险,好奇,崇拜权力,爱荒诞与殊特,甚至爱凶狠,爱暴虐爱胜利与摧残,爱自我的实现。”徐志摩认为,有一种超人的幻想支配着丹农雪乌的追求,他试图从他面临的现实世界里寻求他超人的理想。这其中深深地带着尼采的思想烙印。由此又造就了他对于纯粹的艺术的美的追求。

丹农雪乌是欧洲社会大动荡、大分化时期激进文人的代表,他鼓吹铤而走险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追求奢侈豪华和变态纵欲的生活;向往权力,崇尚荣誉,带着狂热的激情力图在深感不满的客观实际中实现自己的奇异理想。由此就不难理解丹农雪乌后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即使他末年曾忏悔道:“目睹这惨淡而又痛苦的一生,我真想抹去自己曾有过的那些经历——如今想起来真令人毛骨悚然。”而堕落的劣迹是无法抹去了。

徐志摩赞赏丹农雪乌出类拔萃的才情,也认识到了他那强烈的偏执禀性。徐志摩说:“他的理想的生活当然是过于偏激的。他的纵欲主

义,如其不经过诗的想象的清滤,容易流入丑恶的兽道;他的唯美主义,如其没有高尚的思想的基筑,也容易流入琐碎的饰伪。至于他的理想的恋爱的不可能,他自己的小说即是证据。”

徐志摩还对其代表作《死的胜利》《无辜者》《快乐儿》等作了精彩评述,很有导读价值。

徐志摩也从托尔斯泰有关生活与艺术的关系的论述中,看到现实世界对于艺术所具有的重要影响。他说:“艺术是不能脱离生活独立的,它的生存与发展是基于有一定条件的。生活不允许的时候,艺术就没有站住的机会。”当然,徐志摩的认识也有一定的偏颇,他认为“乱世与文化是不相容的”,“只有在生活允准我们闲暇的日子,我们才可以接近艺术、创作艺术”。似乎文化艺术只是有闲人在无忧无虑的日子里才能创造出来,这显然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许多伟大的文化艺术作品,正是出自生活最窘迫的非有闲人之手。

当时的现实是黑暗的,生活是缺乏生机的,徐志摩期待着一个平和光明的时代的到来,从而也期待着出现“文艺复兴”。他说,我们现在的意识是破碎的、断续的,“期望有那一天,到时候这些断片碎屑重复能合成一个无裂痕的明洁的整体,凭着天光的妙用,再照出宇宙的异命”。

1923年,泰戈尔来华,成为文化界一件大事。徐志摩在《太戈尔来华》一文中,阐述了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精神。他让读者深入“体会太戈尔诗化中的人格”。诗人的内心境界,外人是难以捉摸的。内心深处的痛苦挣扎,在那奥秘灵府中凝聚成了深邃的哲理的思想。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纠正狂放恣纵的意气,增强慈悲同情的爱心。

徐志摩强调的不是泰戈尔文学创作的本身,而是对其人生观、文学观的极度推崇。由此也给人以启示:我们应当从文学创作中,看到思

想,看到灵魂,看到胸怀,看到心境,而不只是作品本身的情节的研读。

四、关于文学与人生的思考

徐志摩写过多篇图书序言,他曾在自己的文集序中自称“是个为学一无所成的人,偶尔弄笔头也只是‘随兴’,那够得上说思想”?因此,也有朋友评他:“志摩感之浮,使他不能为诗人;思想之杂,使他不能为文人。”也许就是这种“随兴”弄笔头吧,他的序言也就多是些琐碎话,皆是对当时有关情境有感而发,也确实不是什么思想深刻的论说了。

然而,在《〈五言飞鸟集〉序》和《〈醒世姻缘〉序》中,却可以看到他对于世情人生的看法。前者强调人的心灵与大自然的和谐,他由《五言飞鸟集》作者的诗,联想到泰戈尔的诗说,认为“文字只有在诗人的手里是活的”,它可以使人从中看到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本真,看到诗人人格的颜色,“像晚霞在雪地里渲出使人心醉的彩色”。在《〈醒世姻缘〉序》中,徐志摩更是对这部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作了深入论述——

其一,这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写生。他认为《醒世姻缘》“把中下社会的各色人等的骨髓都挑了出来供我们赏鉴”,个个人物身上特有的气息,从他们的神情语调、举动意愿中,形象地展现出来。作者的眼光非常冷峻,他看透了人情世故,“任凭笔下写的如何活跃,如何热闹,他自己永远保持一个客观的距离”。从而使小说中的怪象与人生的面目达成了高度的一致。

其二,这是一部有关男女关系——也就是有关婚姻的大书。有关婚姻中的男女纠纷,恶姻缘中的人生悲剧,会促使人不能不思考怎样做“才可以希望增加合式的夫妻与良好的结婚生活”。这事关全社会的

和谐与安定,自然是不可小视的大问题。

诚如徐志摩所比喻的:《醒世姻缘》“是一幅大气磅礴一气到底的长江万里图,我们如何能不在欣赏中拜倒”!

总之,徐志摩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贡献,是不容忽略的。本书所选编的他的文章,或可作为其注脚吧。

陈益民

徐志摩谈文学创作

目 录

天下本无事	1
再来跑一趟野马	9
关于《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的讨论	15
从小说讲到大事	19
近代英文文学	25
丹农雪乌的作品	41
丹农雪乌的小说	47
《涡堤孩》引子	56
托尔斯泰论剧一节	
——附论“文艺复兴”	59
太戈尔来华	63
说“曲译”	70
致胡适	73
南国的精神	77
一封公开信	79
我为什么来办 我想怎么办	82

徐志摩谈文学创作

迎上前去	88
《剧刊》始业	94
《剧刊》终期	98
《新月》的态度	101
《诗刊》序语	108
《诗刊》前言	110
《诗刊》叙言	113
《落叶》序	116
给陆小曼的信	
——《巴黎的鳞爪》代序	118
《翡冷翠的一夜》序	119
《轮盘》自序	121
《猛虎集》序	123
《五言飞鸟集》序	128
《醒世姻缘》序	133

天下本无事

我在《努力》第五十一期上做了一篇杂记，题目是《假诗，坏诗，形似诗》，却不道又引起了一场官司，一面仿吾他们不必说，声势汹汹的预备和我整个儿翻脸，振铎他们不消说也在那里乌烟瘴气的愤恨，为的是我同声嘲笑“雅典主义”以“取媚创造社”，这双方并进的攻击，来得凶猛，结果我也只得写了一封长信，一则答复成仿吾君，乘便我也发表连带想起的意见，请大家来研究研究，仇隙是否宜解不宜结；如其要解，是否彼此应得平心静气的。我最看不起吵架的文字，因为吵架的文字最不费劲最容易写，每当吵架的时候，我总觉得口齿特别的捷给，文笔也异常的流利。难怪吵架这样的盛行！晨报的副刊这一时倒颇不寂寞，张君劢的人生观，张竞生的爱情，惹出一天星斗，光怪陆离的只是好看；现在我又来凑趣，也许凑不识趣，重新提起评诗的问题，又要占据副刊不少的地位，我又觉得抱歉，又觉得可笑，所以这篇，虽则是封致仿吾的信，就定名为《天下本无事》！

仿吾兄：

这封信我特别请求你在《创造周报》上公布。

方才一位友人，气急败坏的到我们清静的图书馆里来，拿一张

徐志摩谈文学创作

《创造周报》向我手里一塞，口说“坏了坏了，徐志摩变了‘Fake man’了！”

我看完了那《通信四则》以后，感想颇不单纯，现在我提起笔来平心静气的写一封复信，盼望你和其余看到这信的诸君，也都能平心静气的看。

我说平心静气，仿佛我心原来不平气原来不静似的，但这又是用字句的随便(世上多少口角只是原因于用字句之随便!)，因为实际上我非但无气，而且有极真的心想来消解在他人心里已经发动的不必有的气哩。如其我感觉到至少的不安，那就为的是你不曾问我的允许，将我给你私人的信随手发表了。固然你是乘着一股嫉伪如仇的义愤，急于“暴露”“假人”的真凭实据，再也不顾常情与友谊，但我猜想你看了我这篇说明以后，也许不免觉得作事有时过于操切罢？

在我解释一切以前，我先要来一个小小的引子，请你原谅。赛司德顿(G.K.Chesterton)有一句妙语，他说一个人受过最高教育的凭据，就在他能嘲笑自己，戏弄自己，高兴他自己可笑的作为；这也是心灵健全的证据。最大的亦最可笑的悲剧，就是自信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人，永远不会走错路，永远不会说错话。是人总是不完全的。最大的诗人可以写出极浅极陋的诗。能够承认自己的缺陷与短处，即使不是人格伟大的标记，至少也证明他内心的生活，决不限于狃狃地悻悻地保障他可怜稀小畏葸的自我。我个人念了几年心理学的成绩，只在感觉到在我“高等教育”所养成神气活现的外形底里，还有不时在密谋猖獗的一个兽性的动物，一个披发的原人，一个顽皮的孩子。上帝知道我们深奥的灵魂里，不更有奇丑的怪物，可怖的陷阱暗室隐藏着！

这段小引是不很切题的；我所急于盼望我自己和他人共有而且富有的，就是一句不易翻出的英国话——A Sense of Humour。万事总得看透一点：人们都是太认真了，结果把应得认真的反而忽略了！

适当的义愤是人类史上许多奇事伟迹的动机，但任性的恚怒，只是产生不必有的扰攘，并且自伤贵体；我们知道世上多少大战变乱灾难，都是起源于人体的生理作用，原因于神经的反射性过强；我们应得咀嚼“文王一怒而天下平”的怒字，不应得纵容自己去学那些 Externally exasperated housewives!!

我的友人多叫我“理想者”，因为我不开口则已，一开口总是与现实的事理既不相冲突也很难符合的。我是去年年底才从欧洲回来的，所以不但政情商情，就连文界艺境的种种经纬脉络，都是很隔膜的；而且就到现在我并不致憾我的隔膜。比如人家说北京是肮脏黑暗，但我在此地整天的只是享乐我的朝采与晚色，友谊与人情：只要你不存心去亲近肮脏黑暗，肮脏黑暗也很不易特地来亲近你的。政治上我似乎听说有什么交通党国民党安福党研究党种种的分别，教育上也似乎听说有南派北派之不同，就连同声高呼光明自由的新文学界里，也似乎听说有什么会与什么社——老实说吧，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畛畦。我一向只是一体的否认这些党派有注意之价值，但近来我期望最深的文艺界里，不幸也常有情形发现使我不得不认为是可悲的现象——可悲因为是不必有的。

我到最近才知道文学会与创造社是过不去的，创造社与努力报也是不很过得去的。但在我望出来，却不曾看见什么会与什么社与什么

徐志摩谈文学创作